

主编 / 季羨林

贾植芳

· 吉林摄影出版社

花与鸟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花 与 鸟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贾植芳 著
藏书章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谷向阳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花与鸟 贾植芳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龙震海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贾植芳】1915年生，山西襄汾人。高中就读于北平。“一二·九”运动中被捕，1936年春出狱后赴日本，入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科。抗战爆发后回国，从事抗日活动，1945年被日伪徐州警察局逮捕，日本投降后出狱。1946年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编。1947年被中统特务机关逮捕，1948年出狱后以著译为生。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教授。1955年因胡风案入狱，达十一年。1980年平反。现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小说集《人生赋》、《人的证据》，散文集《热力》，论著《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译有《契可夫的戏剧艺术》等。近年著作有《劫后文存》、《狱里狱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等。

目 录

作者小传	(1)
花与鸟	(1)
曲阜行	(5)
且说说我自己	(8)
我的第一篇小说	(15)
我的读书记	(20)
关于读书	(27)
我的称谓忆旧	(30)
我的戏剧观	(35)
由两个小男孩想到的	(38)
我话老年	(42)
世纪印象	(44)
上海是一个海	(49)
萧军印象	(53)
我的老乡王瑶先生	(59)
记胡风的一首悼念鲁迅的诗	(66)
我和胡风同志相濡以沫的情谊	(69)
悼念陈仁炳先生	(87)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纪念我的朋友卢杨（克绪）先生	(94)
我与陈瘦竹先生的交游	(100)
悼日本友人相浦杲教授	(104)
怀念丸善书店	(110)
遗失的原稿	(120)
一双明亮的充满智慧的大眼睛	(125)
胡风的《酒醉花赞——怀贾植芳》诗	(133)

目

录

花 与 鸟

屋檐下的花

在我的蹩脚的“寓所”的阳台上，在公用的自来水旁边，不知是哪位有雅兴的邻居，把他的败残了的两盆花摆在那用一小片旧油毛毡作为屋檐的窗户下面。我理解这位邻居的感情。这两盆花曾给他带来独居中的欢乐和安慰，使他在生之烦恼中体会和领略到人生的意义和要求，理想和爱意，但是它们日渐枯萎了，这仿佛又使他警觉到生命之终不免于枯萎和凋零，正在追求生之理念和欢乐的人，对于冲进生活眼帘下的一切象征着不幸和残酷的事物，是会皱眉和痛苦的，甚至于会给他带来幻灭之预感的，但他不是一个受过残酷成性的“正规教育”的人，他仍然具有人的纯真和善良的性能，或者说，在人性遭到蔑视和毁灭的长期动乱中，他像处女之于自己的童贞之维护和坚持，他仍然执著于自己的人的意义和价值，而不以残酷和无情作为生活的资本与土壤，他没有把它们弃之如敝屣，抛进垃圾箱，然后拍拍手上的土，

马上把它忘个干净，仿佛它们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一样，而是带着哀怜的心意，无可奈何地把它们移放在这个窄小而又显得荒僻的屋檐下，把它们的命运交还给它们自己。这应该是我们时代的最高的人性表现，是一种博大的宽容胸怀，一种值得称道的君子之风。

我在一次洗手时，发现了这两盆在风雨中飘摇挣扎的花，我同情它们被遗弃的命运，我的发热的双眼流出了热泪，我本能地折回去，拿了一只小杯，给它们浇了水，我似乎看见它们对我怀着感激的微笑，花的微笑，我感到我和它们的生命之命运之相通，我感到生命之被恢复的欢乐，生之昂扬。

于是，这成了我的一种生活内容和习惯：我每天都浇灌它们，用一只小杯，我看见它们那些枯萎的叶子渐渐脱落了，在它们的根茎上萌发出了新芽，它们与命运搏斗而获得了大胜利和大喜悦，我则衷心感谢那和它们始终共忧乐的那盆中的小小的一撮泥土……

小鸟和它的新居

邻居是个青年工人，他有一个体质瘦弱的女孩，为了给孩子添加一些生活欢快吧，他不知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捉拿到一只平常的小鸟，又亲手用嫩树条作了个粗糙的笼子，作为小鸟的新居。我从此听到小女孩的不断发出的稚弱而纯真的笑声，她显然从那在笼中跳跃和鸣叫的小鸟的姿态中，发现了自己的快乐，于是纵情地

表现出来了，甚至有时候高兴得跳起来了。她的幼小的心灵还不能理解，小鸟在笼中的鸣叫和跳跃，是它对命运的斗争和抗议，那是一种由莫大的痛苦汲取来的力量。

生命是需要欢乐的，问题是它的获得的方式。

用别人的痛苦换取自己的欢乐，这是一种对人性和生命的极大的侮辱和摧残，这使我感到最大的痛苦和愤怒，我不能忍受，但是我又同情那个稚气的女孩，谁叫她还是个孩子呢？难道我们的成年人，甚至是饱学之士，不是也在生活的急流中被一些花言巧语或豪言壮语弄得热泪盈眶，忘掉了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意义因而把自己的形象弄得光怪陆离，以至不可收拾吗？

于是，我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在多半个世纪以前，在我们这个“五千年古国”的土地上那个空前的智者和勇者，第一次响彻云霄的呐喊：“救救孩子！”

但这个小女孩从生活中发现的欢乐并不能维持多久。过了几天，我们听不见小女孩欢快笑声了。妻说：“这个陌生的小鸟，大概是被几只煤炉的煤气给熏坏了，所以叫不出声音来了。”在我们这个“大杂楼”里，进门的地方，是个空旷的所在，是各家居民做饭又兼交谊的场所，这里没有窗户，门一关，它就密不通风，显得黑洞洞了，小鸟和它的新居就被安置在一个暗淡角落里。这时，我第一次地走近了这只小鸟和它的新居，我看到它垂着头站在那里，正如俗话说，已近乎奄奄一息了。

我正确地体会到这只小鸟的认识世界：用人间的手给它建筑的这个新居，原来是一个监狱，那是窒息生命

的地方，是地上的坟墓。

它的世界原来是在晴空、密林里，不是说“天高任鸟飞”吗！又过了一天，我听到邻居的老妇发出的吃惊声音：“鸟儿不见了！”

我丢下手里的物件，连忙奔向那个小鸟的新居，笼门开了一条缝，主人给它准备好的一些拌着鸡蛋的饭粒，好好地摆在里面，那只垂首而立的小鸟的形象，已成为我记忆中的存在了。

妻子说：“昨天邻居阿公提出一个建议，说是这个鸟不吃不喝，不鸣不跳，是因为那个笼子通风的空隙太少了，把栅门放开一些，让它多吸一些空气吧。”而这只小鸟，却用尽它的生命的余力，从那个一条缝似的窄门里飞走了，回到它原来的世界去了。

我站在小而窄的晒台上，抬头望着碧蓝的万里晴空。我祝福那只振翅重新翱翔在自由天地里的小鸟，它战胜了自己的命运，获得了生命的源泉：自由。

原载香港《文汇报》1983. 11. 20

曲 阜 行

前一个时候，我又有机会去了一次曲阜，参观了孔府孔林等名胜古迹。作为一个旅游点，那里现在是游客如云，财源茂盛。这是我第二次到曲阜。

第一次去曲阜，大约在 1983 或 1984 年吧。那次是去徐州参加瞿秋白学术讨论会，会后专程去曲阜参观的。当时带队的是当地孔子研究所的一位年青研究员。一路闲聊时，他对我讲起了这样一个笑话。说是笑话，却又是真实发生的故事。那是在“文革”“批林批孔”的狂潮中，我的几位同事如已故的周予同先生和严北溟先生，都作为“孔老二的孝子贤孙”被造反派揪到这里，当场批斗殴打。但当时还有一位“响当当的造反派”的教授先生，却著文说道：孔老二的根子不正，他老子叔梁纥是个流氓阿飞，而他则是叔梁纥和他妈这对“狗男女”野合的私生子。这位青年朋友笑着说道，这位教授先生是在借今喻古，他大约是由当今的一些生活现象联想猜测而得出如此结论的。因为现在的城市小青年，即使搞了对象，甚至领了结婚证书，但由于没有住房，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所以有时只好夜间在公园或街心绿地的林

荫处相互亲热，因而被警察或纠巡人员当场查获；这样的新闻，报上时有所见。于是那位教授先生也就受了启发。但孔子之父叔梁纥是鲁国的官僚，他倒是不愁分不到房子的。书上记载的所谓“野合”，其实不过是指没有正式履行结婚仪式便同床怀孕了，因为据说孔子之母颜征是叔梁纥的二房等等。

听到这个真实故事，还有那位年青朋友的评点，我禁不住引发了联想。对在左祸为患的年代里，那种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为了“革命需要”而不惜篡改甚至编造历史的学风文风，又一次患起了“感冒”。

那位青年朋友还对我说：在“文革”中，孔庙内的许多塑像被毁，孔林中那些由历代帝王立下的石碑也被砸断。现在看到的景象，是打倒“四人帮”后重新修复的。接着，他又引我参观大成殿两侧走廊内供奉的历代儒家高徒们的木制牌位，从孟子以下，有董仲舒、程氏兄弟、朱熹等等，记得最后一个牌位是清代的曾国藩，这之后就没有了，但那安置牌位的位置却还空着。我见到此景，便建议不妨补上一个当代的“大儒”，那位曾被鲁迅先生指为“才子加流氓”的头号文痞倒是很够格的，排在曾国藩之后也符合“历史的需要”。大家听罢，哈哈大笑二番散去。

这次我再去曲阜参观孔府孔林，是由山东大学外文系的一位年青朋友做向导的。走到孔林时，他指着石桥下的河水，也讲述了一个故事，这回是个传说故事，不过也颇有趣味。

相传这条河本是秦始皇时下令开凿的。作为焚书坑儒的补充，他命阴阳先生看了孔府孔林的风水，随后就下令在孔林前挖下这条河来，意在破坏孔家的风水，要孔门断子绝孙，实际上是要读书人，也即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灭种断后。谁知后来的事实却正好与秦始皇的主观愿望相反，因为此河一开，孔家的风水反而更好了，孔门的香火因而也就更加旺盛，念书人反而越来越多。不过到了“文革”，红卫兵与“革命造反派”们冲进这里，砸烂了孔府孔林，挖开了孔家的祖坟，倒是继承并实施了秦始皇未了的遗愿。……直到现在，才把这些又一一修复了。

我听完这些，不由得想起“文革”中的一段往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所在单位的红卫兵与“革命造反派”们，上挂下联，给正在“监督改造”的我也戴了顶“孔老二的徒子徒孙”的帽子。这真如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往往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禁不住一阵苦笑。

1993年7月在上海寓所

且说说我自己

编者先生给我出了个题目：“说说我自己”，我听了不禁失声笑了起来，因为这是一个大家都面熟的老题目。从五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来，以迄史无前例的“文革”，在频繁的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接受过现代科学和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意识和思考精神的中国现代各类知识分子，在大一统的政治权力意志的支配下，被作为“改造”和“再教育”的对象，他们都得以深厚的原罪意识，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说说我自己”的陷坑中，挣扎图存，以致往往被扭曲变形，甚至殒身亡命，酿成了一代人的悲剧，历史悲剧。以至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以后，当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的新时期，他们步履艰辛，仍然惊魂未定，心有余悸和预悸！

对我说来，顶着一个所谓“作家”、“教授”的招牌，当然在劫难逃，而且情况还比较突出。1955年那场“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兴起以后，我就大祸从天而降，蒙御笔亲批为“分子”，捉将官里去，以“钦犯”身份，“说说我自己”十一年；1966年“文革”前夕，我又被定

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押回原单位，作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监督对象”、“四类分子”、“阶级敌人”、“专政对象”、“牛鬼蛇神”、“臭老九”以及什么“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老反革命”、“孔老二的徒子徒孙”，等等，在“群众专政”的红色风暴下，“说说我自己”凡十有三年，前后共“说说我自己”二十五年。1980年，胡案作为冤假错案平反后，我由鬼变成了人，真是眼睛一霎，老母鸡变鸭，我又被作为“作家、翻译家、教授”，应一些骗纂人名辞典的单位及个体以至英国剑桥的国际传记中心来函来访，要我“说说我自己”。因此，我真可以说是“说说我自己”的“专业户”或老油条了。这不仅又使我想起三十年代初，在北平的美国教会办的学校读书时，我那些带洋气的同学常讲的一句口头禅：“人生本是 to play，何必终日 study”，真有些玩世不恭的虚无党味道了。但这次受《收获》这个严肃的文学刊物的嘱托，要我“说说我自己”，因此，我得避开过去老一套的报流水帐的公事公办的手法，写点我的人生际遇，以及对人生的一知半解的零碎感受，就教于今天的读者朋友。

我虽然从三十年代以来，就开始学习写作文学作品，并出版过小说集、散文集，也写点剧本和杂文等，但我充其量不过是文坛上的一个散兵游勇；虽然我甚至因文受祸，在新旧社会都吃过断命的政治官司，但它们只能是我在崎岖不平的人生道路上的一些零星的体验和感受，我自己的一些思想和感情的浪花的自我表现，有的还是

鲁迅先生所说的“遵命文学”，真如向黄浦江小便一样，它们没有什么影响力量，并且从五十年代以后，就基本做了“绝育”手续，实在算不得什么作家，而且我也早忘了我自己还曾是一个作家。八十年代初期，我又蠢蠢欲动，试图重新挣扎，写了些小说和散文。当时，中国的政治大气候虽然开始改变了，文艺界的小气候似乎还未变，或者由于历史的惰性，变得很慢。我是一个有“前科”的人，这又使一些编辑望而变色，甚至排了版还得抽下来。为此，除过一篇散文被朋友转到香港《文汇报》发表，一篇小说被我们家乡的文艺刊物登出，为我亮相外，此后我就很少写这类东西，面带微笑地向我从青年时就迷恋的文学创作告别，完全办妥“绝育”手续了。

1935年冬，我热血沸腾，在党的影响下，参加了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发布了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凡在马路上游行，散发反动传单，呼喊反动口号，张贴反动标语者，格杀勿论，就地正法。”我为此被北平警察局逮捕关押，受到该局特务科的审判。我那个当商人的伯父，为此特地赶到北平，到处找门路营救我。我们家住山西吕梁山区，世代以经商务农为生，祖辈没出过念书人，和当官为宦的更不搭界。正是因为我伯父在大码头经商，办的又是洋务，见多识广，知道在现代社会知识的价值，因此，他才决心让我们弟兄走出闭塞的山区到城市上学。三十年代，正是中国深受内忧外患、困扰最严重的时候，从国际大局